

世界小说

100 篇

西方高校文学系中短篇小说教材

世界小说100篇(中) [美]詹姆斯·H·皮克林编
陈登 颐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3.375 插页:4 字数:524,0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0

统一书号: 10097·415

定价: 2.00元

目 次

- 外套 尼古拉·果戈里 (1)
三怪客 托马斯·哈代 (36)
瑞普·凡·温克尔 华盛顿·欧文 (62)
四次会见 亨利·詹姆斯 (81)
天国之车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 (123)
改变计划 布鲁斯·杰伊·弗里德曼 (146)
偏僻的内地 威廉·H·加斯 (157)
缀满蛛网的房屋 乔治·吉辛 (197)
坦纳西的合伙人 勃烈特·哈特 (222)
我的亲戚莫利纳斯少校 纳撒尼尔·霍桑 (235)
罗杰·马尔文的葬礼 纳撒尼尔·霍桑 (259)
年轻的吉德曼·布朗 纳撒尼尔·霍桑 (282)
诗人 赫尔曼·赫斯 (300)
杀人者 厄纳斯特·海明威 (307)
岭雪 厄纳斯特·海明威 (322)
普通的一天 谢利·杰克逊 (353)
误入歧途 丹·雅各布森 (368)
丛林之兽 亨利·詹姆斯 (383)
米勒小姐 亨利·詹姆斯 (437)
镇上的穷人 莎拉·奥恩·朱厄特 (505)

- 阿拉比 詹姆斯·乔伊斯 (522)
死者 詹姆斯·乔伊斯 (531)
常春藤日 詹姆斯·乔伊斯 (584)
饥饿艺术家 弗朗兹·卡夫卡 (605)
玫瑰园里的阴影 大卫·赫伯特·劳伦斯 (618)
魔桶 伯纳德·马拉默德 (637)
两洋食品商场 约翰·厄普代克 (660)
园丁 拉迪亚德·吉卜林 (672)
他们 拉迪亚德·吉卜林 (687)
没有教士的祝福 拉迪亚德·吉卜林 (717)

外 套

尼古拉·果戈里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里(1809——1852)出生于乌克兰的索洛钦茨，成年后起初在彼得堡当小官吏，在那里接触了俄罗斯京城的文艺界人士，并结识了亚历山大·普希金，受他们的熏陶，辞掉小官吏的职务，专门从事写作。1831——1832年果戈里的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两卷本出版了。1835年出版了历史题材小说《塔拉斯·布尔巴》，接着又于1836年出版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获得成功。1842年出版了《死魂灵》，果戈里自己认为是他最优秀的作品。

果戈里最闻名、评价最高的作品《外套》被选进1842年出版的《果戈里文集》里^①。据说，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过：“我们都是从《外套》里出来的”。当然，这句话是不足凭信的。但从这个传闻可以看出，对于十九世纪俄罗斯所特有的那种感伤情调的文学的发展来说，果戈里占多么重要的位置了。

^① 《外套》最早出现于1835年出版的《彼得堡故事》里。——汉译者按

在某个司里……我还是不点明是哪个司吧。世界上再没有比什么司啊、团啦、办事处哇，说实话再没有比任何衙门的官儿们更会大发雷霆的了。现在每个人都认为侮辱了他本人就是侮辱了整个社会。听说，最近，就有某个县的警察局长，我记不清是哪个县的了，递交了一纸呈文，他在上面明白地提到，国家的法制岌岌可危，国家的神圣名义正在任意被人滥用。他还随文附呈了一大卷浪漫小说，以为佐证，小说里有个警察局长每隔十页就出现一次，有好几次出现时都喝得酩酊大醉，颓顿不堪。因此，为了避免惹下麻烦，我们最好还是把这里讲到的司叫做某个司吧。

且说，在某个司有个公务员，他说不上是什么仪表堂堂的人物，个子矮矮的，脸上有点麻，头发红不溜秋的，眼睛视力模糊，呆滞无光，头顶上秃了一小块，两颊布满了皱纹，脸色蜡黄，一般患痔疮的人才有那样的脸色……有什么法子呢！这应该归罪于彼得堡的气候。至于说到官衔（我们这里是最注重官衔的），他是个所谓的终身九品评议员，一个芝麻官。众所周知，各种各样的作家都要将这种人拿来尽情地嘲弄和取笑。那些作家有一种值得赞扬的嗜好，就是欺侮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老实人。这个公务员姓巴什马奇金。光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此姓是从鞋子①变来的；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从鞋子变的，那就没法说了。他的父亲、爷爷甚至妻舅，以及所有的巴什马奇金家的人都毫无例外是穿靴子的，每年还得换两三回底呢。他的名字叫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也许，读者会觉得这个名字取得有点牵强古怪。但是，我可以担保，这

① 在俄国，有一种鞋子叫巴什马赫。——译者注

名字一点也不牵强，因为在当时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给他取别的名字。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将近黄昏时出生的，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一天是三月二十三日。他故世的母亲，是一个公务员的老婆，一个贤慧的女人，她已经适时地为儿子受洗命名做好了一切准备。母亲躺在朝着门口的床上，右首站着教父伊凡·伊凡诺维奇·叶罗什金，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人，曾在枢密院里当文书股长；还有教母阿丽娜·谢苗诺芙娜·别洛勃柳什科娃，她是巡长的老婆，一个具备罕有品德的女人。他们向满心欢喜的产妇提了三个名字任她挑选：莫基亚，索西亚，或者给孩子起一个殉教者的名字：霍兹达扎特。“不行，”可怜的妇人想，“这都是老一套的名字。”为了称她的心意，大家把日历翻到另一个地方，于是又跳出了三个名字：特里费利，杜拉，瓦拉哈西。“这真是磨烦人啊，”做母亲的说，“都是些什么名字啊！说真的，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名字，瓦拉达特，或者瓦鲁赫，已经够坏的啰，还偏偏来个什么特里费利，瓦拉哈西。”大家又翻过一页，又出来了巴甫西卡希和瓦赫基西。“得了，我明白了，”做母亲的说，“看来他命该如此，既然这样，就让他叫父亲的名字好了。他父亲叫阿卡基，那么儿子也叫阿卡基吧。”他就这样取名为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了。孩子在受洗礼的过程中，呜哇呜哇地直哭，并且做出各种鬼脸，好象他已经预料到自己将是一个芝麻官了。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我们这样交待一下，好让读者明白，这一切都是势所必然，根本不可能起一个另外的名字。他是哪年哪月到司里供职的，是谁任命他任这个职务的，这一点谁都记不起来了。然而有一点却很清楚，不管换了多少司长和各种各样的上级，我们始终看到他坐在同一个地方，摆出同一种姿势，干着

同一个职务，始终是一个抄公文的抄文公。因而，以后大家都认为，他命里注定生来就是个身穿制服，头上秃顶的文书。在司里没有人对他表示尊敬。当他进门的时候，看门人非但不站起来，甚至只当是一只小小的苍蝇飞过门廊，连瞅也不瞅他一眼。上司对他冷冰冰的，盛气凌人。文书股付股长经常把一叠公文朝他鼻子底下一塞，也不说一声“请您抄写一遍。”或者“这个小案件倒是挺有意思的。”或者说一两句文明官场中令人惬意的客套话。而他接了过来，眼睛只盯住公文，也不看一看给他公文的是谁，这个人是不是有权力支使他。他接过公文，就马上动手抄。年轻的公务员们挖空心思把办事员那号人所能想到的俏皮话都拿出来嘲笑他，戏弄他。他们给他和他的女房东，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婆编造出各种故事，当他的面大讲特讲，说这个女房东经常打他；他们问他和女房东什么时候举行婚礼；他们还把碎纸片撒在他的头上，说是下雪了。但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仿佛在他面前连个人影也没有似的，从来一声也不吭。这甚至并不影响他的工作：不管别人怎样取笑逗弄，他连一个字也没有抄错过。只有当玩笑开得太过火，使他实在受不了——人家碰他的胳膊，使他无法抄写下去的时候，他才说：“放我过去吧！让我安静一下吧！为什么你们老要侮辱我呢？”这句话和说这句话的声音里，包含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一种引起人们同情怜悯的东西，以致一个刚踏进官场的年轻人本来学别人的样子，也来嘲弄他的，突然象心灵被刺痛似地呆住了。从此以后，在他心目中仿佛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一种奇怪的力量使他一反常态同已经结识的同事们疏远开来，他以前一直把这些人当成有教养的体面的人物呢。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哪怕是在最高兴的时刻，在

他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那个秃顶的、个子矮小地位卑微的文书，和他那一句痛心的话：“放我过去吧！为什么你们老要侮辱我呢？”这句痛心的话里他还听到另一句话：“我是你的兄弟啊。”于是，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不禁双手掩住自己的脸。以后，在他的一生中，他好多次看到在一个人身上有那么多非人道、残忍的东西，在温文尔雅、知书明理的彬彬有礼的人们中间，老天啦，甚至在被公认是德高望重的绅士中间，竟隐藏着那么残忍野蛮的东西，这时候，他总是感到毛骨悚然。

很难找到象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这样忠于职守的人了。如果只说他是办事热心，还嫌太轻——不，他简直是酷爱自己的工作。在那里，就是在抄写工作中，他仿佛看到一个变幻多端，令他心旷神怡的世界，在他的脸上时常流露出愉快的神色。有几个字母是他特别喜爱的，只要他写到这几个字母，就会非常得意，暗自窃笑，一会儿眨眨眼睛，一会儿又嚙嚙嘴唇，好象从他的脸上可以读出他笔下写的每一个字母。如果按照他克己奉公的程度颁奖的话，也许他会大吃一惊，竟可以捞到个五品文官的头衔；但正象他那些嘴巴刻薄的同事们所挖苦的那样，只捞到纽孔上挂个皮带扣，腰酸背痛。当然，也不能说从来没有人注意过他。有一个司长，是个厚道人，见他多年辛劳，很想奖掖他一番，于是派给他一个比普通抄写略为重要一点的差使，就是要他把一件现成的公事换个抬头，加上“等因奉此”的字样，另拟一封公函转给别的机关。可是就这么个差使却累得他汗流浃背，他终于擦擦额上的汗说：“干不成啦，还是给我点东西抄写抄写吧。”从此以后，别人也就一直让他干抄写的活了。对他来说，好象世界上除了抄写以外，什么东西也不存在了。他根本不修边幅：他身上的制服已不是绿的

了，而变成铁锈般的褐色，带点污泥的颜色。制服的领子又窄又矮，因此，尽管他的头颈不长，可伸在领子外面显得特别细长，好象俄国的许多外国小贩盛在托盘里顶在头上到处叫卖的摇头晃脑的石膏小猫的脖颈。而且，在他的制服上总粘着什么东西，不是些碎稻草，就是些线头。而且他还有一种看家本领，每次上街，走过某个窗口的时候，总赶上人家扔出各种各样的垃圾，弄得他帽子上老是挂着瓜皮一类的脏东西。他一生中从来不注意每天街上发生的事情，不去注意他的年轻的同事经常目不转睛盯着看的事情。咱们大家都知道，那些年轻公务员的锋利的眼睛，其明察秋毫的本领，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他们可以看得见对面人行道上某一个人裤子的背带松松地搭拉下来——这种事总是引得他们狡黠地咧开嘴笑。

如果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也在看什么的话，那么，他在任何地方看到的总是自己恭恭敬正地写出的一行行清晰整齐的笔迹。只有当蓦然出现的一匹马，将头伸到他肩膀上，鼻孔里喷出一阵热风放到他腮帮上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不是在字里行间，而是走在马路当中。他一回到家，马上就往桌子旁边一坐，匆匆忙忙地、大口大口地喝白菜汤，狼吞虎咽地吃一块洋葱牛肉；他从来辨别不出什么滋味，总是连菜带苍蝇以及老天爷碰巧赐给他的别的什么东西都一起囫囵吞进肚里。觉得肚子开始发胀了，他就站起身来，拿出一瓶墨水，抄写带到家里的公文。要是没有公事可做，他就特意给自己抄一个副本，藉以取乐，特别是当某件公文不仅文体优美，而且是呈送某个新上任的官员或者显要人物，因而妙不可言的话。

甚至在那种时刻，当彼德堡灰濛濛的天空完全昏暗下来，全体官员们按照各人的薪俸和口味尽量食不厌精地吃饱喝足的时

候——当机关里的笔尖簌簌声已经静息，各种的喧闹已经停止，自己的和别人的必须办的公事已经完毕，连好管闲事的人也把承揽的事情办完，大家都去休息的时候，——当公务员们忙里偷闲，急于把空余的时间用于享乐的时候，有的劲头比较大的，就奔向戏院；有的去逛马路，把时间消磨在对女人们评头论足；有的去赴晚会，对某个颇有魅力的姑娘——小小官场中的明星恭维捧场。最为常见的是，有的人干脆到同事家里去，他们住在四楼或者三楼，两间不大的房间，带有一间门廊或者厨房，房间里摆设一些赶时髦的摆设，如精巧的壁灯啊，或者用省吃俭用牺牲了好饭菜和游览换来的精美的小玩意儿啦，——总之，当所有的公务员都分散在自己朋友家的小公寓里精神十足地玩惠斯特牌，一边品着玻璃杯里的茶，一边啃着用几戈比买的甜面包干，吧哒着长烟斗喷出烟雾，在发牌时讲述一些从上流社会里传出来的流言蜚语——这是每个俄国人无时无刻不可缺少的乐趣，即使没有更好的事情可谈，把这个说了千百遍的关于某个司令官——被人谎报，法尔孔纳塑造的纪念碑^①上的马尾巴被砍掉了这类有趣的轶事——再重复一遍也好，总之，当大家都去尽情寻欢作乐的时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却从来不作任何消遣，谁也不能说，曾经看到过他参加哪个晚会。他抄写够了，就上床睡觉，一想到明天上帝不知又让他抄写什么东西了，就不由地露出了笑容。一个挣四百卢布年薪已感到心满意足的人，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平静的生活，也许，这样的生活会一直继续下去，直到他耄耋之年，如果在他生活道路上（其实也不仅是九品评议员，而且三品、四品、七品以及一

^① 指十八世纪法国著名雕塑家法尔孔纳创作的彼得大帝纪念碑。——译者注

切评议员，甚至那些既不评不议，也不接受别人评议的评议员们，也无不如此）不是布满各种灾难的话。

在彼得堡，每个挣四百卢布左右年薪的人有一个死敌。这个敌人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北方的严寒；尽管有人说这种严寒是有益于健康的。每天早晨，八点至九点，也就是正当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到各个机关去上班的公务员的时候，朔风开始一个劲儿地狂吹，抽打着每个人的鼻子；真是凛冽砭骨，那些可怜的人们简直不知道把鼻子往哪儿藏。连养尊处优的大官都往往被冻得头痛脑胀，眼泪直流，可怜的九品评议员们的情况可想而知，有时简直是快冻死了。唯一的御寒办法，就是裹紧单薄的外套，尽快地跑过五六条街，然后在门房里拼命跺脚，直到在路上冻僵了的官能和办事能力解冻为止。近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开始感到他的脊背和肩膀冻得特别厉害，尽管每天都使劲地尽快跑完规定跑的一段路。他终于怀疑，毛病是否出在外套上。回到家里，他把外套里里外外仔细地检查一遍，发现有两三个地方，正是在背脊和两只肩膀上，已经成了筛网了：呢子破旧不堪，简直照得见光，里子都露出来了。这里需要交待一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这件外套也是公务员们嘲弄的笑柄；他们甚至取消了外套这个高贵的称号，而管它叫包装套。事实上他的这件外套也确是与众不同：领子一年比一年缩小，因为被剪下来去补其他地方了，而那些补丁也根本不是什么裁缝手艺的典范，补得又笨拙又难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找出了病根以后，就决定把这件外套拿到裁缝彼得罗维奇那儿去，这个裁缝住在某处的四层楼上，从后楼梯出入。他虽然是个独眼龙，又是个满脸麻，可是缝补起公务员们和其他人的裤子和上衣来却很拿手。当然啰，你得明白，我是说在他没有

喝醉，脑子里没有其他杂念的时候。区区一个裁缝，当然无需赘言，但是现在有种惯例，就是小说中每个人的性格都得充分刻划，所以我也只好把彼得罗维奇描述一番了。他本名格里高利，是某位绅士的农奴。后来他脱离奴籍了，于是逢年过节，起初是每逢大节日，后来就不管大小宗教节日，只要碰到日历上画着个十字，都要放开酒量狂饮一番，从此以后，人家就尊他为彼得罗维奇^①了。他是恪守祖祖辈辈的风俗习惯，很讲究家长的规矩的。他跟老婆吵架，就骂她是臭婆娘和德国婆。既然小说里提到了他老婆，按说也得描写上两句，但是很抱歉，关于她的事情我们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彼得罗维奇有个老婆，这婆娘平时是戴帽子而不是扎头巾的。说到相貌，显然无法夸赞，只有那些近卫军士兵碰到她这个女人的时候，才把她帽下的脸庞窥视上一眼，拈拈胡子故作惊异地怪叫一声。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爬上通往彼得罗维奇家的后楼梯。说句公道话，楼梯上到处侵渍着污水和泔浆，到处无孔不入地弥漫着刺痛眼睛的酒精气味，咱们都知道这种气味和彼得堡房子的后楼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边爬楼梯一边已经在盘算彼得罗维奇会开口要多少工钱，他暗中盘算最多不会超过两个卢布。房门敞开着，因为彼得罗维奇的老婆正在煎鱼，熏得厨房里油烟弥漫，连蟑螂爬过都看不见，所以阿卡基耶维奇穿过厨房，主妇竟没有察觉。他一进房间，就看到彼得罗维奇象个土耳其总督似的，盘膝坐在一张没有上过漆的大木桌上。他按照

① 斯拉夫人的姓名，分为名、父称、姓三个部分，彼得罗维奇是父称。彼此不熟悉的人称呼对方的姓，冠以先生、公民、同志或职称。对于很熟悉而又不用客气对待的人可以直呼其名。名字和父称是表示尊重对方的称呼。——译者注

裁缝的习惯，坐着干活的时候赤着一双脚。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首先看到的是他早已看惯的那双大脚趾，畸形的油灰趾甲象乌龟壳似的，又厚又硬。彼得罗维奇的脖子上挂着一绺丝线和一绺纱线，膝盖上铺一方块破布。他已经穿了三分钟的针，还没有把线穿进针眼，所以他对房间里昏暗的光线很恼火，说实话他对这根线也十分恼火。他低声嘀咕着：“穿不进，娘的，你这个淘气坯，好烦人啊！”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见此光景，就暗呼不妙，心想不该在彼得罗维奇心情不好的时候来找他。他喜欢在彼得罗维奇喝得微醺，或者象他老婆所说的“这个独眼鬼，灌饱了嘶嘶响的马尿”的时候来找他干活。在这种时候，彼得罗维奇总是在价钱上很迁就，满口应承，甚至还点头哈腰道谢。后来，当然啰，他的老婆会哭哭啼啼地跑来说，他当家的喝醉了，价钱要的太低了。不过加给他十个戈比也就完事。而这儿，彼得罗维奇看来神志很清醒，所以又臭又硬，特别难说话，不会让主顾占半点便宜，鬼知道他会胡要多少价钱。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看出情况不妙，正想俗话说的打退堂鼓溜之大吉，可已经晚了。彼得罗维奇正眯紧了独眼，直瞪瞪地盯着他瞧呢。于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由自主地冒出了句：“你好，彼得罗维奇！”“祝您好，老爷！”彼得罗维奇边说边斜着自己的独眼朝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手里瞭了一下，想看看他带来了什么货色。

“我来找你，彼得罗维奇，那个，你看见吧……，”看官请注意，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每说明一件事情总啰哩啰嗦说上一大堆毫无意义的虚字眼。如果事情棘手，他压根儿就说不成个整句子，所以他往往用这几个字开头：“这个，实在是，你明白……”接着就卡了壳，什么话也出不来了，别人直发

愣，连他自己也稀里糊涂地以为要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什么事啊？”彼得罗维奇边说边瞪着独眼把他整个外套从领子到袖口过细地打量一番，这些都是他非常熟悉的，因为这全是他自己的手艺活。见面后第一件事就是这样仔细打量，哪个裁缝都有这样的习惯。

“那个，是这样的，彼得罗维奇……这外套，这呢子……你瞧，哪儿都很结实，只是，嗯，沾了点灰，好象旧了，不过，它还是新的，只有一个地方，有点，有点……在后背上，还有在一只肩膀上稍微磨破了，这个肩膀上，也有一点，你瞧，都在这儿，费不了多少工……”

彼得罗维奇接过“包装套”，先把它摊在桌上仔细检查了好大一会儿，摇摇头，然后伸手从窗台上取下一只圆形的鼻烟盒，盒盖上画着一个将军，可不知道是哪位将军，因为这个将军的脸被手桶了个窟窿，后来在上面补了一小块方纸片。彼得罗维奇吸了吸鼻烟，双手将“包装套”撑开，对着光线细看了一遍，又摇摇头。然后，他把“包装套”翻过来，里子朝上，看了看，再次摇摇头。他又把画着脸上贴着小纸片的将军的盒盖打开，拈了点鼻烟塞到鼻孔里，把烟盒放到一边，终于开口说道：

“不行，补不成了，这衣服烂得不象话了。”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听此话心都凉了。

“为什么不能补了，彼得罗维奇？”他简直是用小孩子的哀恳语调说话，“这个，只是肩膀上，磨破了一点，哎，你不是有一些碎呢子吗？……”

“是啊，碎呢子可以找到，”彼得罗维奇说，“可咋补上去啊，料子都稀烂了，针刚穿进去，线就脱出来。”

“脱就脱吧，你就补一块试试看。”

“往哪儿补？补上也巴不牢，穿得太破烂了。这哪还能叫呢子料？风一吹，呼，补丁就飞了。”

“唉，那么用什么把它补补牢吧——我向你保证：实在的，这个是……”

“不行，”彼得罗维奇一口咬定。“实在没办法，这衣服实在不能穿了。您还是到十冬腊月天冷的时候，把它扯开做绑腿布吧，因为长统袜不暖和。长统袜是德国人发明的，为的是多赚俩钱（彼得罗维奇一有机会就喜欢挖苦德国人一下）。要说到外套嘛，您可得做件新的啰。”

一听到“新的”这个字眼，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立刻头晕目眩，屋里的东西都变得模糊起来，只有彼得罗维奇的那只鼻烟盒盖上贴的小纸片上的将军，还在他眼帘里晃着。“做一件新的？”他说，感到好象是在做梦，“可我没有这笔钱。”

“对，做件新的。”彼得罗维奇用粗暴、冷淡的语调说。

“那么，是非得做件新的，那个……这个要多少……”

“您是说，要花多少钱？”

“是的。”

“至少得一百五十卢布。”彼得罗维奇说罢，意味深长地把嘴巴闭得紧紧的。他非常喜欢给对方一个强烈的印象，喜欢突然来个杀手锏，然后冷眼瞅着对方张惶失措的怪相。

“一件外套要一百五十卢布？”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高声惊呼起来。也许他还是生平第一次这样呼喊，因为他说话一向是低言悄语的。

“唔，”彼得罗维奇说，“就这，还得看什么样的外套咧。要是领子是貂皮的，加上个绸里子的风帽，那就得二百卢布。”

“彼得罗维奇，劳驾。”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用恳求的声调说。他没有听，也不想去听彼得罗维奇的那些话，这番惊人之谈算是白费了。“凑合着补一下吧，能应付着再用一段时期就行了。”

“不行，那准是工夫白费，工钱白花。”彼得罗维奇说。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听了这话，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彼得罗维奇目送他走出房门，意味深长地撅着嘴唇，站了好一会儿，才坐下来干活；他很满意没有降低自己的身份，也没有糟蹋高尚的裁缝手艺。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迷迷糊糊走到街上，好象做了一场梦。“原来，会弄成这个样子，”他自言自语地说，“说真的，我实在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他顿了一会儿，又说：“是这么回事啊！结果事情竟弄成这个样子，我，实话，一点也没有料到会弄成这个样子，还有……，”他又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冒出了一句：“啊，是这样的！简直一点也料不到，谁能想得到啊……会是这样的！”他喃喃自语得迷糊了，没有往家里走，而不知不觉地朝相反的方向走去。路上一个满身是黑灰的笨手笨脚的扫烟囱的人由他身后擦过，把他肩膀都擦黑了；满满一帽兜石灰从一幢正在修建的房子的顶上掉下来，撒了他一身，他竟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后来他和一名岗警撞了个满怀，那个岗警正把长柄斧搁在身边，从一支牛角里往粗糙的手心上倒鼻烟。岗警朝他吆喝了一声：“干么不走人行道，净往别人身上撞？”他这才清醒了一点儿，环顾了一下，转身走回家去。回家以后，他定下神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真实处境，开始不是胡言乱语而是合情合理地、坦率地同自己交谈，就象同一个能倾吐衷曲的明智的朋友交谈一样。“不行，